



以社会史的视野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

江 沛

中国当代史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1978年至今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多侧重于以中共党史为重点的政治史、以宏观经济为重点的经济史和以政治领袖为重点的人物研究，对于以政治社会为基本特征的20世纪中国而言，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意识形态的诸多压力，受制于档案史料的限制利用、重要当事人不愿接受采访等困难，也会困扰于各地因诸种条件不一而形成的社会形态的千差万别，这使得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常常疏于事实考证与叙述，惯于片面总结的高谈阔论，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以至于出现中国当代史研究论著寥寥，新意少见，而欧美与日本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却方兴未艾、影响日重的窘境。

此外，从工业革命之后世界趋向一体化直至今天民主化潮流席卷全球的发展路径而言，考察一国或某一区域进程的历史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史、环境史、医疗史、交通史等领域的兴起及全球史研究方法的时兴，表明人类社会认识自我的视野，已从单纯的民族-国家立场转向了对民众生活质量的评判、对不同国家及区域联系的重视和对人类共同发展路径的思考。中国史学界也在激烈辩论着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探讨着国家强大与民众自由、幸福间的辩证关系、争执着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社会公平、财富分配孰更合理？然而，这些争论仅仅局限于政治史的分析而不注重国家政策、经济手段于社会层面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将社会史研究视野引入中国当代史领域，无疑具有认知转变的重要价值和学科建设的可操作性。

一. 以社会史的视野，收集档案、口述史料，自下而上完成对历史实态的叙述。

目前最高层面的中央档案馆及部分省级档案馆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档案多不开放，而有关地区经济体系建设、商业贸易形态、社会结构、阶层变化、民众生活等方面的资料因“无关宏旨”却是允许使用的；由于体制改革、城建迅速，不少机关、学校、企业于搬迁过程中废弃的大量档案资料或流入旧书市场或被各地收集，这些史料的价值同样值得重视。如华中师大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近期出版的《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9种（东方出版中心）、山西大学收集的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队资料、南开大学华北文书研究中心收集的华北诸村资料等；此外，一些经历丰富、曾在地方担任要职的政界人物、大学教授、文化名人等，正在撰写回忆录并以自印方式出版，内中不乏填补空白、揭露内幕、叙述清晰、内容真实、分析精当的好作品，各地政协文史委的文史资料也时有各地重要事件的回忆文章。而近年来互联网风行后在网络世界形成的诸如博客、微博、网上留言等，同样也是反映当下民间舆论、社会思潮的重要资料。这几类资料加上各地出版各类年鉴、全书、简史、通志、组织史等，可以使研究者对于底层史态及上层政治、文化与底层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而较为全面的

分析。当这些研究日益丰富之时，共同的研究成果会成为一种倒逼机制，形成对民情民心、社会舆论、上层政治的追问，也会随着研究深入而逐渐形成底层与上层史态间的清晰关联，从而完成对某种历史形态的构建。

傅斯年曾言：史料即史学，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基础价值。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而言，没有史料无疑于无米之炊。以社会史视野收集资料，通过把社会史方法引入当代史研究，对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习俗及政治、经济社会化影响的思考，利用民间资料、档案文献及口述史料，构筑中国当代史基本的底层史态，是打破意识形态制约、推动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 以社会史的视野，自下而上地关注政治运行下民众的生活实态及社会发展特征

随着社会科学理论跨学科进入或渗透人文学科的现象日益扩展，史学理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18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背景恰恰是工业革命后工业经济崛起、代议制度建立后影响社会结构、阶层及精神文化最为根本的因素从政治转换为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主体也不仅仅是政治精英主导，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民众运动及全民选举同样可以颠倒政治、扭转乾坤。中国史学也有一个从撰著“二十四史”为帝王将相的立传著史到近代史家关注精英阶层，再到大众文化兴起后聚焦底层民众生活实态的变化。显然，当代史学研究的对象及范式已有了一个从上到下、从精英到草根、从制度到生活的深度拓展，这是世界进入近代以后时代对于新史学的呼唤。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及层次无疑较欧美发达国家为低，至少在改革开放政策推行前的30年间，政治依然主导社会变革。然而除了关注高层政治何以如此之外，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才是描述历史的关键所在，而社会政治化形态也才是历史的表征。我们应该摒弃那

种高层文件下达——省市级传达——下层动员——反响广泛的单线式历史记述思维，在强调政治社会化的强大力量同时，要看到因诸种条件产生的复杂性，看到底层民众对于政治理解的不同及混乱对上层政治的反作用。看到即使在“大跃进”那样的狂飙中，一些地区没有跟风逐潮反而受益，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全国性动乱中，依然有不少地区较为平静。如金大陆所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描述，真实生动，打破了“文革”时代人人不食人间烟火、时时运动的政治动物印象。无论政治如何狂野，生活才是社会发展中的主流，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文化、价值观念才是社会发展的根基。改革开放时期政治运动退潮后，务实的国家政策与民众追求生活质量的诉求，不仅让政治退回应有的位置，也使中国社会结构更加合理，经济与社会的进步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全景式的考察不仅难以涵盖各地复杂的情况，也难以形成令人信服的宏观结论。因此，区域研究才是当代史走向深入的必由之路。比如，在东部沿海相对发达的城市及省份，其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进程与中西部农村大省的表现差异明显，“大炼钢铁”运动中，资源大省的山西与工业大省辽宁的表现形式也千差万别，这一进程中的典型当然在河南、广西、山西等农业大省；“文革”是以城市带动乡村来展开的，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北京的红卫兵运动自然全国瞩目；改革开放时期，东部处于开放前沿，开放呈自东南向西北阶梯式发展的态势，深圳特区及广东省、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天津及环渤海区域各领风骚，其经济发展形态与中西部显然迥异。这种不同是由各地理条件、经济基础、民情民风、政治决策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只有深入理解各地历史复杂的演进模式，才能真正从宏观的高度思考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特征。

社会史的视野同时还是一个史观转换的结果，从以往中国革命史的长期影响下走出，经

社会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的拓展，历史学本身也在经历着一个史观转换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特别是近现代史学界，饱受中国革命史观的影响，视政治、意识形态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仅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线，而且将革命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与矛盾的根本所在，在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国度里，反而把意识形态放在了经济变革之上，岂非咄咄怪事？！此外，这种史观形成的一个线形思考在史学界极度泛滥，即：中央文件发布——省市领导传达——下层民众响应——各级总结成就，似乎所有的区域、领域都有一个样，把历史复杂性、人的能动性、环境因素、国内外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完全置于度外。事实上，无论政治如何强大，历史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在民众生活、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关键性领域。没有对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视，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历史叙述。

三. 以社会史的视野，历史性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即历史研究不可避免要回答时代的命题，也多从时代发展中找寻灵感、为民众答疑解惑，为未来走向提供历史性的思想资源。

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要求以长时段的视野考察历史发展的传统与基础，突破1949年这一政治界线，注重在革命、战争、时代背景下变动中的传统、文化与习俗的力量，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式改革会以渐进的方式展开，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何以会在中国连连碰壁，当代中国的执政模式与思维与中国革命经验积累成的红色文化间的关系如何？也要求以全球史观，拓宽思路，把中国的变动与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紧密相联，强调近代中国在西方拉动下进入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后的外在大因素。

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告别“文革”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在自豪于用30年走完欧美国家100多年工业化道路的同时，也积压了欧美国家百余年间遇到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日益富裕的现代化进程中，旧有体制的弊端与现代社会管理需求、民众维权诉求间形成了尖锐矛盾，自1949年开始融入中国文化的革命理念也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市场机制、民主、人权理念相冲突。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思潮，一是以怀念毛泽东时代所谓社会公平与道德正义为号召的“回归派”，一是坚定的追求现代化道路的“改革派”，两种思潮相互纠缠、互相砥砺，不仅引发了中国知识界与文化界重建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呼吁，也在史学界触动了反思当代中国历史进程、重新思考当代中国历史基本主线及价值判断的潮流。

在中国当代历史演进到今天，是在继续追求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平衡社会利益分配、监督权力运行以重建道德、公平的社会价值观，还是回到毛泽东时代以建设道德、公平价值观来限制经济增长和人们的利益追求，这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而言，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从历史演进的视野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命题！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可以通过社会史的视野，把区域经济发展、民众生活实态、社会阶层变动、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结构变化历史性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把60余年来的生活水准、收入与分配、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口增减数量与工业增长与体系、GDP增长、城镇化进程、工业化程度相关联，把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医疗卫生、社保事业、慈善事业等发展相关联，从而为民众呈现出一个只有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只有彻底推进传统体制的改革，只有实现真正的权力监督，才能有真正的社会公平、权利平等的政治认知，才能使人们对于当

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有深切的体会，才会确立中国当代历史走向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四. 以社会史的视野，吸引青年学者、学生进入研究领域，构建研究群体

在今天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中国当代史研究已经呈现繁荣前的松动迹象，如华东师大杨奎松、沈志华教授领衔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已成为推动这一学科向前发展的两大推手。但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矛盾敏感期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国当代史 30 年来反思不足与教育缺失的现状，教育管理层即有中国当代史必须按照 1983 年“历史决议”的统一口径描述、不能自由探索的惯性认识，时常对当代史领域的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进行抽查，一些所谓的“专家”不以历史研究规范进行评定，否定青年学生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新评价，动辄扣下大帽子，致使不少高校及研究机构都出现青年学生、学者不愿意从事中国当代史领域的研究以免“找事”。因此，中国当代史研究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是，如何鼓励大批青年学生、青年学者参与其中。

在此背景下，通过从社会史视野入手，尽可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可以通过收集、解读地方、社会史史料深入探讨中国当代史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避免人云亦云，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逐步形成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社会史基础，避免因缺少资料而硬性解读高层政治内幕的分析，同时还可以使青年学生在开阔视野中既避开意识形态影响的压力、努力学习、深入研究，真正关注 20-21 世纪中国历史走向及现实意义。相信今天的状况不可能永久下去，但研究群体的构成不能等中国当代史领域的开放再建设，而需要有更多创新的、足以打动社会的成果问世，自下而上、持续地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向前发展。